

徐杰舜 / 主编

小荷尖尖

XIAOHEJIANJIAN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
学学院03级硕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集

XIAOHEJIANJIAN

小荷尖尖

徐杰舜 /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荷尖尖/徐杰舜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6

ISBN 978 - 7 - 207 - 08258 - 9

I. 小... II. 徐... III. 人类学—文集 IV. Q9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6522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封面设计:韩冰

小荷尖尖

Xiaohe Jianjian

徐杰舜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98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258 - 9/D · 1080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前 言

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有上下连绵五千年的历史,又恰逢当代中国处在社会大转型的伟大时代;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一些海归派人类学博士的归来,2009年第16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将在中国召开,以及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仅就摆在我们眼前广西民族大学02级硕士研究生写的学位论文,读后一股欣喜之情涌上心头,这些人类学研究的“小荷”,不正是悄悄地向人们传递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信息吗?

一

选入《小荷尖尖》的这六篇论文都是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2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这六位作者分别是罗彩娟、林海、陆进强、罗柳宁、陈婷和黄福东。每个同学都根据自己三年来所学到的人类学知识,较成功地完成了硕士论文的写作。六篇论文的研究主题分别涉及文化人类学的仪式和家族研究、经济人类学、法人类学、旅游人类学以及族群研究等人类学学科中不同的研究话题。选题可谓具有代表性,有很大的学术意义,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研究方向。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六篇硕士论文就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一幅画卷,相信读者阅读这六篇论文之后,定会有游览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研究意象之感,若是初学者,更可从中增加对人类学的感性认识,如他们对各自调查地点深入的田野工作,这一人类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和他们用人类学知识进行分析的努力,都是值得一读的。此外,这六篇学术论文可以对即将撰写学位论文的硕士研究生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因为这些论文大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规范的学位论文。总而言之,不同的读者势必会从这些论文中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二

文化多样性,反映在本书所选论文的文化表达也是多样的。具体来说,每位

作者的论文都各有所长。首先,我要评述的是罗彩娟的论文,即《家族超度——大化壮族超度亡灵的民族志研究》,写的是一个壮族家族的超度亡灵仪式,全文共分六部分,以一个案例为主,对家族超度的具体仪式程序、仪式的原因、功能和象征意义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的民族志研究。

这篇论文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的过程翔实而细致;资料翔实,理论联系实际,实际应验着理论,富有原创精神。具体的成果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论文的选题,罗彩娟选择了一个融汇了道教、佛教和自然宗教、神灵崇拜为一体的亡灵超度仪式为研究题目,并抓住了大化县壮族在丧葬和超度仪式中的“家族”性文化表演和表述这样一个特点,说明了作者具有相当的学术分辨力和学术感悟力。由于这样的选题有着复杂的宗教内容,从而显示出作者的学术胆识。

二是扎实的田野工作,做到了民族志写作的基本要求。作者前后多次深入田野地点,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方法来全面地收集论文的资料。正是由于田野作业的长度和深度,才能使仪式(包括程序、细节以及相关的象征符号)的描述部分成为论文最为精彩的部分。作者对研究对象是十分熟悉的,而在描述中思路清晰,描写客观,体现了论文作者良好的科研素质。

三是作者良好的分析能力。表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论文的第四、五、六部分中,充分显示了论文作者具有较为深厚扎实的理论素养和逻辑分析能力。尤其是作者在这部分的理论表述中,既表现出现实关怀的学术精神,又体现了多学科知识深透与融合的学术广度和深度。从论文的分析部分看,作者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文化人类学的一般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也比较熟练地掌握了其基本的研究方法。

四是完整的体例结构。逻辑缜密而严谨,行文流畅,论文也兼具多种资料,如历史资料、宗教知识、民间智慧、口述传统和民间巫技等,可见罗彩娟为完成论文所下工夫之深。

林海的《从稻作发展看农民的经济意识变迁》是一篇经济人类学论文。这篇论文研究广西某村的经济意识变迁情况,突破了经济学研究中仅仅关注经济本身的局限,转而关注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思想意识问题。这是一个新颖的主题。同时,正如作者指出的,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村的发展困境是因为农民的经济意识未能适应经济发展要求。但农民的意识又是与他们所处的环境相关的,农民的发展应该是他们的主动性追求,而不是一种对政府工作的被动接受。因此,研究农民的经济意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策略制定和农业发展的具体指导有实际意义。作者通过对一个具体村落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当地农民在土改前的集体生产时期和分田到户后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期的经济意识的变迁,指

出了农民在集体化体制下的经济意识中具有“道德经济”的特点,但并非农民是非理性的,而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民无法真实表达自己的经济意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农民的经济意识得到充分地展现,同时具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意识的特点。农民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方面的意识已经越来越趋向于现代化的商品经济意识。影响这些经济意识变迁的因素很多,有国家的行政力量、科技因素、自然环境以及市场和传统的力量等。通过研究,作者还预测出农民经济意识的未来发展趋势,那就是,“道德经济”成分的减少和“经济人”成分的增强,“理性”成分的增加,农民的经济意识将更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该文为经济人类学的农民研究提供中国的研究案例,并为经济人类学的农民经济意识研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这篇文章的学术贡献所在,特别值得一读。

此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擅长于质的分析,传统的方法基本都是进入一个村庄后,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入访问来获得原始资料,然后对这些资料进行质的分析。该文除此之外,运用量的分析方法也是一大特色,这更接近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许只有量化的数字最能说明经济问题。而林海是本校 2002 级惟一一个提前进行硕士论文答辩的同学,也就是在 2004 年 5 月,他提前一年跟 2001 级的毕业生同时进行答辩,并通过了答辩。在短短的两年硕士学习阶段结束前,他就完成了别人三年才完成的学位论文的撰写,可见他的学术功底较深,这也得益于他在大学本科四年的民族学专业学习的知识积累。这对他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陆进强研究的是瑶族的石碑制与民族法制建设关系,他是为了回答盘村的新石碑制的历史、功能以及它是如何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及其对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意义等问题而选这个题目来研究的。作者通过田野研究,并以 13 个案例为资料来说明瑶族新石碑的产生、内容和运行状况等,分析了新石碑的性质、运行机制以及新石碑的命运等问题,认为新石碑起到了盘村社会控制的达成和社会秩序的重构作用,以及新石碑对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立法、普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法人类学的研究已取得的不小的成就,民间习惯法也越来越成为人类学关注的对象。这篇有关瑶族习惯法的研究在关注地方法律与国家成文法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所创新,没有局限于石碑制这一地方法律本身的解释,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讨论地方法律对国家成文法具有的意义,从而打破了过去对地方法律的偏见。无疑对我们今天如何更好地对待习惯法、村规民约等地方法律在维护社区秩序上所发挥的作用提供新的视角,对法人类学关注的读者可一睹为快。

罗柳宁的论文《壮侬互动:现象与动因》是以那坡县平孟镇念井屯跨国民族为例来探讨族群认同问题的文章,角度十分新颖。该文运用 22 个个案,生动地

给我们展示了跨国民族——壮族与越南的侬族之间在语言、生产生活、经贸、姻亲等四个方面的互动图景及其族群认同,并对其互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较为熟练地运用了族群认同理论中的原生论和工具论以及巴斯的边界论来研究跨国民族的认同问题,并对他们的认同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多元认同——在不同场景下的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三种认同之间又密切相关,国家认同涵盖了地域认同和族群认同。这对族群认同理论作出了贡献。

该文的一大特色是它把故事性描述融合在严肃的学术论文里,在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上是个突破。其实,人类学的写作并非一定要用正规的、不带感情的语言来建构,只要能表达作者的观点,在语言形式和文章的编排上都可以灵活掌握,带有文学色彩的学术作品也许更加吸引读者的眼球。

陈婷的《瑶族传统文化与生态农业》一文是以恭城县一个瑶族村落为例子来展开论述的。瑶族传统上是个以刀耕火种为主的游耕民族,长期以来,这种游耕的生产方式被认为是与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的。也就是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势必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从而影响人类的永续发展。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正是想对这种传统的成见提出质疑,并通过实地调查恭城县的瑶族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就是从解放初的刀耕火种方式到20世纪末以来以沼气带动发展起来的生态农业生产模式的变迁,指出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时代,人们构建了一套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传统哲学,也就是环境保护的意识;新的生态农业模式从实践中体现了保护环境的效果,有益于生态平衡。同时,作者还从传统文化中找出许多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平衡的精髓,认为传统文化并非完全与现代化相冲突,从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解释。陈婷从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的观点进行论述,除了关注人们的经济行为外,还详细考察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这是难能可贵的。

黄福东的论文《民族旅游中文化的表述及真实性问题——龙胜细门红瑶旅游的发展》,是在回答旅游中的表述与真实性的问题时,探讨表述与真实性在我国正在发展的少数民族旅游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它是怎样产生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将如何演变?并探讨研究旅游中的表述与真实性问题对今后我们开发少数民族旅游的指导意义。该文以恭城县的一个红瑶村寨旅游开发为调查对象,深入描述了导游和村民在该旅游景点的表述和展演,他们的表述具有“真假参半”的特点,同时还对村民在旅游开发前后生活水平和思想意识进行对比,发现了当地群众在旅游开发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同时村民的经济意识也逐渐提高,表现在他们向游客兜售自己从桂林市批发来的各种民族工艺品。论文还对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关心旅游业发展的读者想必会有兴趣。

三

写到这里,本文似乎有过于褒扬之嫌。然而我们应看到,这些论文都是他们三年来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的积淀,是他们跨入人类学学科门槛后的成果,对之进行再多的肯定也不为过。正如“小荷才露尖尖角”一样,谁又能否认终有一天这些“尖尖角”会绽放为美丽的荷花。正是对他们的肯定,才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当然,我们也以客观的眼光发现论文中存在许多的不足。如有的论文在文字表述上过于口语化,欠缺学术上的严肃性,注释不够规范;有的论文田野资料不够充实,许多统计数据都是官方的,应该对村落里做一些统计调查;有的对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了解不深,从而导致理论分析上的粗浅。所有这些都需要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不断提高,不断进步。而我们对他们的学术前途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期望能看到这些“尖尖角”绽放成美丽的荷花!

正因为这种期望是中国人类学的希望之所在,故将这本硕士论文集取名为《小荷尖尖》,以寄托人们对中国人人类学新生代的期望。

徐立群

2006年11月15日

目 录

前 言	徐杰舜 (1)
-----------	---------

家族超度

——大化壮族超度亡灵的民族志研究	罗彩娟 (1)
------------------------	---------

从稻作发展看农民的经济意识变迁

——以广西武鸣县陆斡镇二塘村八队为例	林 海 (61)
--------------------------	----------

盘村瑶族新石牌论	陆进强 (114)
----------------	-----------

壮侬互动:现象与动因

——以那坡县平孟镇念井屯跨国民族为例	罗柳宁 (161)
--------------------------	-----------

瑶族传统文化与生态农业

——以恭城县西岭乡斋公坪为例	陈 婷 (213)
----------------------	-----------

民族旅游中文化的表述及真实性问题

——龙胜细门红瑶旅游的发展	黄福东 (260)
---------------------	-----------

家族超度

——大化壮族超度亡灵的民族志研究

罗彩娟 指导老师:徐杰舜教授

第一部分 绪 论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目前对壮族的研究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但对超度亡灵的专门研究还有欠缺。本研究在学术意义上,可以说具有弥补研究空白的意义,为壮学研究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2. 对于当前人们关注的如何调适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问题,本研究具有提供传统文化的资料借鉴的意义。通过本研究,读者可以更清晰更具体、多方位地了解壮族超度亡灵这一流传至今的传统文化。

3. 在壮族主要分布区域中,至今还保存有较为传统的文化是左江流域、右江流域和红水河流域的壮族文化。而大化瑶族自治县属于红水河流域,对大化壮族超度仪式进行研究,可以代表红水河流域;由于时间关系,本人未能对整个壮族的超度亡灵都做调查研究,但是通过大化这个点的研究,可以为以后进行整个壮族的超度亡灵进行研究提供重要的材料和理论支持,本人打算在今后继续在左江流域和右江流域分别选点对超度亡灵仪式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对整个壮族的超度亡灵仪式有更全面的认识,所以本文可以说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本研究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它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西方文化人类学对有关死亡的仪式与观念的研究

西方文化人类学对死亡文化的研究和探讨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有二:一是人们在死亡发生后所采取的行动:仪式、葬式、禁忌,以及占卜、复仇等巫术行为;二

是原始民族自己对死亡的解释——关于死亡起源的神话传说。^① 这种研究可以追溯到人类学学科建立的早期,即 19 世纪后半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考察了梦与灵魂、阴影与灵魂、生命与灵魂、呼吸与灵魂等等的复杂现象,相信人在梦中或病中灵魂会暂时离开肉体,而死亡则使灵魂永远离去。从而认为灵魂的观念是人类宗教意识的萌芽。

弗雷泽在其代表作《金枝》中探讨了宗教起源的问题,得出宗教由巫术发展而来,最后发展为科学这一理论。弗雷泽注意到了人类死亡意识的演变问题,指出:“在各种形式的自然宗教中,几乎没有一种形式像永生信仰与死者崇拜这样在人类生活中有如此深远的影响”。^②

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对仪式的研究对学术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他提出著名的“通过仪礼”模式这一概念,即分离仪式(与原社会关系脱离隔绝的阶段)、过渡仪式(从一种状况进入另一种状况的中间阶段或曰等待阶段)、整合仪式(与新的社会关系结合为一体的阶段)三个阶段。同时,在不同的人生礼仪中所突出和强调的阶段是不同的,认为丧葬对应于分离仪式,婚礼是一种整合仪式,怀孕、订婚和成年礼对应于过渡仪式。

马林诺夫斯基是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他对死亡文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里。在该书中,他提出仪式与信仰实际上来源于人生的转机,宗教所关注的对象,大部分是人生的重要事件:生育期、婚期与死期。马林诺夫斯基在分析人类对死亡的两重心理的基础上,揭示出仪式和信仰的情感抚慰功能。“未亡人的主要感情乃是对于死尸的反感与对于灵魂的恐惧……一面是对于死者的爱,一面是对于尸体的反感;一面是对于依然凭式在尸体的人格所行的慕恋,一面是对于物化了的臭皮囊所有的恐惧”。^③ 完全消灭尸体如焚化和完整保留尸体如制成木乃伊则是这二重心态最极端的表现。这二重态度的深层心理结构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与对于永生的希冀。人面对死亡时,总有希望与恐怖交织着。这时,“乃有宗教插进腿来,解救情感在生死关头的难关”。^④

象征人类学的代表特纳专门研究宗教与仪式,他提出了“社会戏剧”的观

① 郭于华:《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 页。

② [英]弗雷泽:《永生信仰与死者崇拜》(James Frazer: The Belief In Immortality And The Worship of The Dead, Vol. 1 London, 1913.),转引自郭于华:《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 页。

③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0 页。

④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3 页。

点,不仅把焦点放在逻辑性的构图上,而且还把焦点放在运动性的象征性上。

(二) 国内学者对于生死观念、丧葬礼俗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丧葬礼俗的研究主要从一般生命科学和哲学角度对生死问题给予关注以及与历史学、民俗学等现代科学联袂来进行研究,主要成果有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陈华文的《丧葬史》,何彬的《江浙汉族丧葬文化》,郭于华的《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夏之乾的《中国少数民族丧葬》等著作和崔载阳的《野人的生与死》、李富一的《渔猎民族之葬礼》等论文,还有《民俗》杂志的有关各地区各民族丧俗的记述。

有学者总结出我国现代学者对于丧葬仪礼和死亡观念的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1)他们的研究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识和现代科学的眼光,他们在探讨本民族的文化现象时,部分地借鉴了西方文化科学的理论,同时在基本方法、材料选取等方面又坚持了国学的立场,表现出现代学术思想与传统国学基础的综合。(2)他们的研究仍以搜集、记述、分类为主,对丧葬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及文化意识的关系缺少探讨,更缺少具有深度的理论研究。^①

(三) 家族研究概述

家族一直是人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日本满铁对华北宗族进行调查与研究并出版《中国农民惯行调查》一书。随后,许多学者利用《惯行调查》的资料,写出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如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该书指出,在华北的村落中,族政和村政是分离的,但村政的建立,又离不开各族的支持;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从文化、权力与国家的视角,探讨村落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与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而阐明村落与国家的关系。

此外,弗里德曼关于中国人的宗族组织问题研究留下两部主要著作,即《东南部中国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弗里德曼认为,“构成汉人传统社会的基层单位就是地域化宗族”。“他根据历史文献及田野报告勾画出东南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宗族组织的基本特征,试图通过对地域化宗族组织的结构认识,重构汉人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② 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在苏丹努尔人的研究中发现了宗族组织,出版了《努尔人》,最终形成了世系理论。

中国学者对家族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从家开始推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等许多方面,最后“将以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以家为

^① 郭于华:《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②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基础的各种经济关系,在土地上结合了起来”。^① 他的《生育制度》是关于家及世代关系的论著,通过研究,他道出了人类社会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郑振满在《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考察了明清时期福建的家族组织,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角度将明清时期福建的家族组织划分为继承式宗族组织、合同式宗族组织等三种类型。

徐扬杰在《宋明家族制度史》一书中指出,自宋明以来,家族是在中国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制度体系。宋以后的近代家族的主要特点是提倡敬宗收族,其办法一是建祠堂,二是置族田。祠堂用以敬宗,族田用以收族。祠堂从精神上、族田从物质上团聚宗族,形成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达到收族的目的。麻国庆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以家为出发点,来讨论家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关系。认为“家庭—分家—(宗)族—姓”这一序列是以血缘和姻亲为主线发展出的生活组织单位,“家户—村—乡镇—城市—都会—经济区域……”这一序列却是以户作为生活单位,而延伸出来的地缘组织。而且这两者之间在村落上,在结构和功能上是互补的,有时甚至是一体的。

吕红平在《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一书中探讨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认为家族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种非正式社会组织,曾一度几近消失,但近年来又在不少农村地区有所复活。家族虽在某些方面满足农民的需求,但也不可避免地引起许多社会问题,阻碍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进而认为农村家族及其家族文化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趋于消亡。周大鸣等著的《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一书中则认为,宗族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社会组织,并不会因为经济的现代化或变迁而消亡。并坚持认为,现代化决非意味着与传统的全面决裂、另起炉灶。

王铭铭的《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是他的三篇著述——《社区的历程》、《现代场景中的灵验“遗产”》和《地方政治与传统的再创造》的合编,从不同侧面透视一个村庄的社区史,在继承中反思汉学人类学宗族理论的“东南模式”。此外,还有陈其南的《家族与中国社会》,冯尔康的《中国宗族社会》,黄成康主编的《中国的家法族规》等等相关著作,在此不再一一予以介绍。

三、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大化县流水乡流水村定皇屯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从2003年11月至今,本人已先后在当地进行为期近4个月的田野调查,并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材料。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是这样的一种研究过程:首先,人类学者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

①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些活动被称为‘田野工作’(实地工作),他们的方法也被称为‘田野工作方法’。完成田野工作之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他们的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民族志工作者的个人反省和理论观点的途径。”^①同时本文还将采用人类学的功能主义、象征人类学等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

四、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大化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省中部偏西的红水河中游,东邻都安瑶族自治县,西界巴马瑶族自治县,南接马山县、平果县,北连河池市、东兰县。县人民政府驻地大化镇,距首府南宁市 135 公里。该县辖 3 镇 16 乡,面积 2753 平方公里,人口 41 万多人。有汉、壮、瑶、苗、回、毛南、仡佬等民族。这里地处都阳山脉南端,群山连绵,山与山之间合围形成的小谷地不计其数,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地貌。这里石山、河谷众多,耕地较少,当地人形容为“七分山、二分水、一分田”。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干旱少雨,年均气温 20 摄氏度,气候温和湿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工业较落后,仅在大化建县后,才开始建成两个水泥厂和一个铝材厂。农业以粮食种植为主,农作物有水稻、玉米、红薯、木薯等。特产有木瓜、桐油、板栗、山羊等。玉米一般一年两季,水稻一年三季。

流水乡成立于 1988 年,坐落在红水河畔,位于大化县城北郊区,都(安)大(化)三级柏油路和省道 20 324 线马(山)岩(滩)段分别横贯全乡东西两部;全乡沿红水河岸线长达 40 公里。面积 167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22 689 亩(其中水田 11 159 亩,旱地 11 530 亩),到 2002 年底,全乡辖 11 个行政村,313 个村民小组,6 878 户,总人口 30 422 人,聚居着壮、瑶、汉等 7 个民族。其中瑶族 3 356 人,占 11%;壮族占百分之九十几,壮族在“全县 19 个乡镇均有分布,其中以都阳、已圩、羌圩、岩滩、流水、北景等乡镇最为集中,壮族人口均占全乡总人口的 90% 以上。”^②全乡设立村级党委 1 个,而这个村党委就是流水乡流水村党委,在《大化县情》一书第 268 页有相关记载“2000 年 1 月 20 日,河池地区第一个村级党委——流水乡流水村党委正式成立”,该党委办公室就设在流水村定皇屯。设党总支部 17 个(村级党总 10 个),自然屯或村民小组党支部 80 个,下设小组 109 个,共有党员 1 013 人(其中农村党员 745 人)。2002 年,流水村共有 21 个自然屯,45 个村民小组,1 086 户,人口 4 676 人。全村耕地面积 3 360 亩,其中水田 2 651 亩,旱地 985 亩。村党委下设 9 个党支部,18 个党小组,共有党员 106 名,

① 马尔库斯、费彻尔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9 页。

② 大化瑶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编:《大化县情》,2001 年,第 29 页。

其中25岁以下6名,26岁至35岁10名,36岁至45岁14名,46岁至55岁32名,56岁以上44名;中专文化7名,高中文化20名,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79名。

本文主要以该县流水乡流水村定皇屯为调查点。

定皇屯位于大化至岩滩的省道20324线28km至29km范围内,居民的住房现在基本上都沿路而建。定皇屯的村民,除了外地嫁来的或“倒插门”的人中有其他的民族之外,几乎都是壮族,占该村村民总数的99%,此外有24人(5户)为瑶族,10户为汉族。目前,该屯有520人,118户,男280人,女240人,98%的村民都姓“韦”,其余的则姓“陆”。定皇屯的村民全部都是从内仰屯迁出来的。内仰屯位于定皇屯的东边,相距约一公里,当时分为板紧、板堆、江那、弄内、新仰、旧仰六个生产队。据当地的老人说,大约1000年前就已经有人居住在内仰屯,每个生产队都是依山而居,房屋都建在环形的山脚下。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这六个生产队合并为一个队,称为内仰队。解放前,这里归广西省都安县鸣凤乡亭子村管理;解放后,由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乡流水村管理;1988年,大化乡改建为大化瑶族自治县,原大化乡管辖的事务由新建的流水乡管辖。此后至今,内仰队由大化瑶族自治县流水乡流水村管理。据该村的老人说,这里的人几乎世代都是农民,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里才有一个人当上都安县县委组织部部长。

由于教育的落后,时至今日,这里的村民大多还是文盲,村庄的历史也没有文字记载。听老人们说,在300至100年前,这里经常遭受蝗灾,蝗虫的肆虐经常使这里的农作物收成大受影响。由于科技的落后,农民们无法克服蝗灾,于是向当地的巫婆请教。经巫婆指点,村民们就在他们田地比较集中的地方建了一个祠堂,是专门为祭拜蝗虫用的。巫婆说,只要村民们在每年春季用上好的供品祭拜蝗虫,当年就可以平息蝗灾了。因此,当地百姓就把这个祭拜蝗虫的祠堂称为“定蝗祠”,即为镇定蝗虫灾害之意,“皇”为“蝗”的同音字,现在人们为图吉利,在书写地名时,将“蝗”字改用为“皇”字,这是“定皇”这一地名由来的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据当地老人介绍,之所以叫“定皇”,是因为在古时候,这里有一个祠堂,叫定皇祠堂,(应该就是上文所说的“定蝗祠”)是内仰屯的祠堂。在清朝末年,大概在1910年,由于要建一条砂石公路,这个祠堂就被推倒了,但“定皇”这个名称却一直被当地农民沿用下来,作为原来定皇祠堂附近一带的地名。如今人们在此建房还可以挖到祠堂的瓦片。而当地一位年老的道公却对“定皇”这一命称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一个地名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地理方位及这个地方的环境和龙脉方向,他推断定皇的山脉走向是从亥方而来,而过去所叫的内仰则显示当时的内仰屯是坐北朝南的方向。”

老人们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一小股军队曾经经过这里,但没有给这

里的人造成什么侵害。只是日军到达相邻的亮山村时,为了抓兵抓夫,以发放钱粮为诱饵,召集村民集会。当有村民发现日军摆放在会场边上的机枪时,大呼受骗,造成混乱,村民们在逃窜中因慌乱而相互踩踏,致使几十个农民丧生,这在当地被称为“亮山事件”。但是在书上对这一事件却是这样记载的:“1938年7月21日,广西省政府听了县长杨松涛的话,说抗战团是汉奸组织,派南宁区民团指挥部副指挥官黄建元率兵到大化流水乡亮山村屠杀抗战军民400多人。史称‘亮山惨案’。”^①人们的说法和书上的记载不同,但都反映了一点,那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当地农民群众坚决抗日,并为此付出血腥的代价。

在1978年以前,这里交通极为落后,仅有的一条公路,也是严重破损的砂石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却泥泞不堪,因此,村与村之间的交往也较为稀少。这里的生产一直也很落后,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说,在1990年以前,他们的生活一直都相当贫困,有的家庭直到1990年还无力购买熟盐,只能食用生盐,当时谁家能一日三餐都吃饱就算是家境很不错了。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缺乏来往,这里的村民,尤其是40岁以上的村民,思想观念还相当保守。这体现在对政府扶贫计划和措施的抵触,不愿接受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以及对年青一代在试验新型农业生产方法上的反对,致使政府的多次扶贫措施在这里无法取得预想的效果。

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先进的思想和观念不断传入这个偏僻的山村,人们与外界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尤其在20324省道建成后,交通就显得更加便利。加上70年代出生的人不断外出到广东、海南等地打工,眼界大为开阔,他们认识到了交通对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重要性。这些年轻人逐渐掌握家庭经济命脉之后,为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他们便说服老人,从封闭落后、交通极为不便的内仰屯迁到交通便利的20324省道边上安家立户。这样,从1988年起,有2户人家率先从山里迁居到公路边上。后来,其他村民在慢慢意识到靠近公路的益处后,也纷纷从山里迁出来。直到2000年这六个生产队的农民才全部迁移到公路边盖房安家。如上所述,由于他们迁出后所居住的地方一直以来被称为“定皇”,因此,人们也不约而同地将屯名改为“定皇屯”。由于内仰屯农民的迁移是自发的,并不是政府统一规划或统一安排的。因此,“定皇屯”这一名称虽然村民耳熟能详,但未经有关政府部门审批,所以这个地名还未得到国家承认,在当地派出所还没有这一名称的记载,然而这并不妨碍当地及附近的人们约定俗成地使用这一名称。

因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扶贫政策的支持,加上全国经济大环境的快速发展,定皇屯的人们在慢慢接受现代生产方式,年轻人不断到发达地区打工的努力中

^① 大化瑶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编:《大化县情》,2001年,第93页。

慢慢地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如今,该屯的人们在生活水平上已有了很大提高。据流水村村长介绍,现在定皇屯的十多户有电话,80%的家庭有了摩托车,有些农户还有两到三辆摩托车;90%的家庭有了彩电,有两户还有电脑。村长说,人们的生活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改善,是由于大多数年轻人到广东打工挣回了钱,劳务输出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农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农民生活不断改善的重要原因。

据村长介绍,现在定皇屯所在的流水村的教育还有待发展。整个流水村的人口共计5100人,而全村只有一所小学;全村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80人,有大学文化的仅有7人,而且这7人现都在大城市工作。按照现代化的观点来说,定皇屯村民有480人是文盲,占全屯人数的95%(这里所说的文盲,是指不识字或只有小学文化的人)。由于村民的文化素质不高、思想观念落后,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不重视教育的习惯,现在许多家庭对子女的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甚至有的家庭根本就不支持子女上学,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文化教育对子女将来发展的重要性。在他们的观念里,上学要花一大笔钱,还不如让儿女尽早参加劳动,多为家里创造点收入。即使有的父母送孩子上学,也很少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有的父母连孩子读几年级都不知道。村长不无担心地说,现在本村经济要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太低,而且教育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

第二部分 家族超度亡灵仪式

在当地人看来,亲人死后,活着的人一定要给他(她)的亡灵进行超度。让道公和师公通过超度仪式洗去亡灵生前所有的罪恶和缺点。使亡灵成为一个没有污点的,纯洁的灵魂,从而才能顺利地进入天堂——死者的极乐世界,才能成为祖先。当问及每个死去的人在生前是否都犯下罪恶的行为,当地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说的所谓罪恶,并不仅仅指生前做过偷、抢、杀人等等这些受到法律制裁的罪行,而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过谎话、杀过生(杀鸡、鸭、猪等),或者小时候去偷邻居家的水果、骂过人、不孝顺父母等等这些小事。在道公看来这些“小事”都是罪恶,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每个尘世中的人都有罪,死后一定要超度,否则就上不了天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传统文化理念已深深地嵌入当地壮族人的心中,因此,给死去的亲人超度亡灵对他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以下是采访当地一位道公时,他对当地的道事活动有自己的一番看法:

我们这里盛行的道事活动,其经文依据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它是道教